

还没开始“百年好合”，美印就已同床异梦



有声若震

本报记者 赵恩霆

7月5日，随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开启第三次访问朝鲜，美国与印度原定的首次“2+2”会谈也因此第二次被推迟举行，时间待定。鉴于“2+2”会谈的特殊性，这一结果无疑给美印关系当头一棒。

“2+2”（两国外长和防长）会谈一般常见于关系比较亲密的国家或盟国之间，比如美国与日、韩、澳等国均建立有这一会谈机制。此外，“2+2”会谈有时也会成为大国间就重要议题进行磋商的方式，比如美俄、日俄之间也建立有这一机制。由于外长和防长在政府中的特殊性，“2+2”会谈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具有战略层面的沟通和协调性质。

去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定建立美印“2+2”会谈机制。从当时来看，这对美印双方而言是一个双赢的举措。

在美国看来，这一会谈机制可以进一步拉拢印度，将其逐渐纳入美国亚太-印太战略框架之中。同时，印度还是全球最大的武器进口国和拥有10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去年10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访问新德里期间，对印度极尽赞美之词，称“正在出现的美印战略伙伴关系……能延续100年”。

对印度来说，通过“2+2”会谈模式提升美印关系水平，通过扮演美国全球战略支点的方式，提升自身大国地位和形象，显然是新德里乐见其成的路径选择。

为此，两国曾考虑过多个举行“2+2”会谈的时间，包括去年11月、12月和今年1月。不过，由于很难找到一个两国外长和防长都有空的时间，直至今

月，双方才最终确定在4月中旬举行首次“2+2”会谈。

但计划没有变化快。今年3月，当初高呼美印要“百年好合”的蒂勒森被特朗普突然解职，而新任国务卿蓬佩奥的提名直到4月下旬才获得批准。

这一突如其来的插曲，导致美印“2+2”会谈第一次推迟。然而，6月27日，美国方面再次宣布推迟原定7月6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印“2+2”会谈。当时，美方给出的理由是“不可避免的原因”。现在，答案揭晓了——蓬佩奥要在5日至7日第三次访朝，落实美朝峰会共识。

美国“抓大放小”的行为，显然深深刺痛了印度的心。“2+2”会谈第二次推迟后，有印度媒体就评价道，美印关系处于20年来最低水平。

这个结论并非危言耸听。美印“2+2”会谈命运多舛的背后，是美印在各领域的矛盾。

印度作为武器进口大国，其军事装备近七成来自俄罗

斯，这是印俄特殊关系的直观写照。美国曾劝说印度放弃购买俄制S-400防空系统，理由是印度此举将违反美国对俄制裁禁令，并拿“萨德”系统作为替换选项。不过，美方宣布再次推迟美印“2+2”会谈的第二天，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就批准了从俄罗斯购买S-400防空导弹系统。

同时，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战，其挥舞的关税大棒也殃及印度。上个月，印度宣布将对美国产的摩托车、钢铁制品和农产品等29种商品加征关税，以报复美国的钢铝关税计划，直斥美方违反全球贸易规则，并已损害到印度的出口。

近日，特朗普政府又呼吁所有国家在11月4日之前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否则将招致美国的制裁。对此，作为伊朗最主要的石油出口国之一、日均从伊朗进口近70万桶原油的印度并未响应。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国际合作联合秘书苏迪尔说：“印度不承认单方面制裁，

只承认由联合国施加的制裁。”

可以说，当前印度与美国“唱反调”的三个矛盾点——美俄关系、贸易战和遏制伊朗——都是美国当前外交的重要发力点，个个戳到美国痛处。这样一来，印度的不合作，势必将对美国推进印太战略产生不利影响。

但印度对此早有准备。4月27日至28日，莫迪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并与习近平主席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双方就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战略沟通，对中印关系进行战略规划。5月21日，莫迪非正式访问俄罗斯，并在索契与俄总统普京举行会谈。这反映出莫迪政府已对近一年多来国际政经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有了新的认识和判断，并开始对印度外交的战略布局进行再调整。美印“2+2”会谈将来可能还会重新举行，但“味道”恐怕会与当初特朗普和莫迪确定建立这一机制时相去甚远。

一部《包宝宝》，让西方观众感受中国式亲情



晓莹观世界

本报记者 王晓莹

如果你近期去影院看了正在上映的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的动画电影《超人总动员2》，你会注意到，这部电影“附赠”了一部长8分钟的动画短片《包宝宝》，这部短片中的主人公是个黄皮肤黑头发的华裔妈妈，配乐和情节也充满着浓浓的中国味儿。这是因为，它的导演就是皮克斯的首位华人女导演石之予。

石之予出生于中国重庆，在加拿大多伦多长大，她毕业于加拿大谢尔丹学院动画专业，2011年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参与制作了《头脑特工队》《超人总动员2》等多部知名动画。

正是由于她的文化背景，《包宝宝》的故事也是基于加拿大华人社区的生活：一个华人



《包宝宝》剧照

妈妈因为儿子成年离家而郁郁寡欢，正好意外发现家里的一个包子变成了“包宝宝”。故事讲述了这个妈妈和包宝宝共同成长的故事，向国外观众展示了华人家庭中的亲情。

短片中，小包子睁开眼睛，长出手脚，哇哇大哭起来，看到这一幕的中国妈妈目瞪口呆，配合着墙上挂的红色福字、包宝宝身下的蒸笼，还有中国风的复古配乐，中国味道就这么被传递给

观众。之后，她接受了这个“设定”，把包宝宝当成了自己的儿子，带着他买菜、做饭、打太极，母子度过了许多欢乐的时光。

然而，包宝宝也像很多逐渐长大的子女一样，对妈妈过度的保护表示生气、反抗。很多观众说，短片的后半段非常“恐怖”：包宝宝带回了一个白人姑娘，还把行李打包，想要彻底离开家。争执中，又气又激动的妈妈为了阻止包宝宝的离去，竟

然一口把他吞进了肚子里。

从梦中惊醒后，妈妈才发现这一切都是一场梦境。但这个设定让许多人感到害怕：曾经用爱养育子女的母亲，也可能用爱把子女吞噬。对于这个结局，石之予一开始也很纠结，曾考虑用另一版结局替代。但她的指导老师、《头脑特工队》的导演彼特·道格特鼓励她说，“不要把这段删掉，尽管去体现古怪和震撼的感觉，这是我喜欢它的地方，相信观众们也会喜欢。”就这样，石之予保留了这个结局，她觉得，对于短片中这对特殊的母子而言，这个结局是难以避免的。她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当我们对某人充满了强烈感情时，是不愿分离的。我妈妈就常称我‘亲爱的小宝’，有时候妈妈会说‘恨不得把你放回我肚子里去’，这正是妈妈对孩子最真挚的爱。”

拍摄这个镜头也不容易，“必须要让妈妈一边哭着一边嚼很长时间，还要想象出包宝宝在妈妈嘴里想要逃离的场景”。

为了将镜头做到精致，石之予还找了母亲帮忙。身为华人女性，又曾任四川美术学院老师的母亲，向团队展示了包饺子过程，如何和面、剁馅、擀皮等，这些都被他们拍了下来。她还跟石之予开玩笑：“如果你要把我的形象放进动画里，记得把我设计得漂亮一点！”

《包宝宝》的故事，也让许多欧美国家的亚裔子女感同身受，他们成长在西方文化中，而他们的父母又以独特的东方文化爱着他们。一名美国华裔影评人写道，她自己在青春期时，也曾因为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间的不同与母亲产生过摩擦。在上大学期间，她的母亲总是让她带上满满一袋冷冻好的水饺回学校。她说，《包宝宝》是个有关成长的故事，尽管画面中描述的是中国文化，但从不同视角去看的观众总能体会到一些共性的东西。

这也是石之予的想法，她希望《包宝宝》从另一个独特视角展现中国文化。现在看来，她做到了。

平反一场冤案，让法国躲过一劫



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德国是一个有点“悲催”的存在，由于二战时期曾经对犹太人进行过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不仅每一届国家领导人都要为此事道歉，而且在处理非法移民乃至本国各族群间矛盾时，都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可是你知道吗？德国的这项宿命本来应该发生在它的邻居法国身上，而法国之所以能幸运地躲过这一劫，要感谢一场冤案的平反。

1906年7月10日，法兰西最高法院宣布重审“德雷福斯案”，法官宣布被控叛国罪、间谍罪等多项罪名的犹太裔法军前军官德雷福斯无罪。在法槌落下的那一刻，原本肃静的法

庭中响起了德雷福斯支持者们震天的欢呼声。第二天，法国左翼的报纸如此评价这场判决：“法兰西被从一个危险的悬崖边拉了回来。”

由于二战中纳粹的暴行，今天很多人误认为德国是欧洲最排犹的国度。事实上，从历史上看，排斥犹太人作为一种欧洲普遍的风潮，很长一段时间是以法国为最的。历史上，法国国王为了赖掉欠犹太商人的债务等问题，曾经先后十一次对境内犹太人下达驱逐令。而在当时，愿意接纳犹太人的，反而是排犹传统不那么浓烈的德国。随着越来越多犹太人在德国聚居，德语成了欧洲犹太人最主要使用的语言。而在很多普通法国老百姓的短浅见识中，犹太人就是德国人安插在他们身边的“间谍”。

这种偏见，在19世纪普法战争后登峰造极。当时的法国和一战后战败的德国还真有那

么点神似——都是在大战中败给了老冤家，被逼着屈辱地割地赔款，窝了一肚子火无处发泄。于是，原本就有“间谍”嫌疑的犹太人，成了法国民族主义者的出气筒。偏巧这时，“德雷福斯案”爆发了。

1894年，法国安插在德国驻法大使馆的情报人员在废纸篓中发现一份透露法军边境布防等重要信息的文件。这份文件令法国高层极度惊恐，因为当时德法关系本已极度紧张，如果法军再出了内鬼，法国下次跟德国对仗岂不要亡国灭种？于是法国总参谋部严令反间谍处查办此事。在上司的重压下，对案件毫无头绪的负责人亨利少校凭着个人的主观偏见，武断地认为此事一定是法军犹太军官所为，然后再通过字迹比对，最终锁定了倒霉蛋德雷福斯。在“从重从快”的思路下，德雷福斯被迅速逮捕，严刑逼供下被屈打成招，

最终被判无期徒刑，并押往恐怖的“魔鬼岛”监狱。

事情到此为止，还只是个别军官玩忽职守酿造的个人冤案，但在法国右翼民族主义者的煽风点火下，此事迅速被宣传为“犹太人颠覆法国”的有力证据，一些右翼媒体甚至叫嚣，“所有法国境内的犹太人要么滚蛋，要么死！”眼看着一场纳粹式的排犹运动就要提前几十年在法国爆发了。

所幸，与纳粹德国的高度专制体制不同，当时的法国还有着相当程度的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1896年，法国陆军部情报局新任局长皮卡尔发现该案的嫌疑犯另有其人，在上报上司无果反遭打压后，皮卡尔毅然将该消息捅给了新闻界。1897年11月，巴黎《晨报》整版刊登了这些新证据，给德雷福斯平反的呼声顿时响彻了法国所有左翼媒体。就这样，以德雷

福斯同情者和自由主义左翼为一方，以法国军界以及民族主义右翼为另一方，一场举国论战随之展开。

最终，在德雷福斯案的风潮导致法国政府数轮更替后，该案终于在1906年得以平反昭雪。“德雷福斯案”的平反，让排犹主义在法国遭到了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为了给素不相识的德雷福斯鸣冤，作家左拉曾写下名为《我控诉》的著名评论。在该文中，左拉写道：“真理在前进，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法国人，你们应警醒！当人们把真理埋在地下，它就会在地下积聚起来，酿成爆炸性的巨大力量，而且一旦爆发，就会使一切归于毁灭！”今天回头再看，我们不得不佩服左拉的先见之明，正是他的警告让自己的祖国躲过了这场日后最终发生在德国的“爆炸”。